维埃政权的合法性。

(2)苏联制度供给过剩反映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领域,则表现为"强国家-弱社会"的客观事实,而国家权力过于强大,在某种程度上又表现为公共权力的不可约束性。在苏联,公共权力的不可约束性受惠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执掌政权的苏联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这个先锋队是以人民利益为重,并会自觉为人民谋幸福的,因而它没有必要受到约束,有约束反而会束缚为人民服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在理论上是合理的,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不受约束和监督导致了政治上的不负责任的"乱作为"现象,即使官员们犯了错误,只要目的高尚,那也没有什么关系。所谓"目的高尚"便成了免责的通行证。这在表面上保护了官员和公共权力,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在削弱着政权的合法性。法国学者德尼·里歇的观点即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政治权力免受惩罚的情形,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不仅仅是领导者,而且同样是整个政治机构失去了它们的信誉。如果政治体制过分地保护了它的领导人,它就只能使自己更加趋向于脆弱"。①

三、结语

在苏联 70 余年的历史中,制度供给过剩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改变、解决,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看,制度供给过剩的苏联没有正确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苏联未能处理好政治与经济、文化、社会等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虽然制度供给过剩主要是政治领域的问题,但是由于苏联主要是一个政治性的国家,政治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因而政治领域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那么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生活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过剩的制度也就成为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的阻碍性力量。一是苏联未能处理好党群、官民关系。制度的意义在于其所具有的普遍价值,然而,苏联的制度却染上了特殊主义色彩,它主要是用来约束、管理民众的。管得太多太滥,必然损害了民众的自主性、创造性和对制度的忠诚;管了又管不好,则必然有损于政府和官员的权威和形象,有损于制度的感召力、凝聚力。

党群关系的嬗变与苏联解体

韩晓燕

(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上海 201100)

20 年来,我国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共产党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一观点强调了党群关系的解体是苏联解体的前奏。② 笔者主要基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党群关系对这一观点作进一步探讨。

一、苏共党群关系的发展、变化历程

所谓的党群关系,宏观上讲,就是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微观上讲,是指政党与组成社会的各个团体、公民、选民以及自治性组织的关系。党群关系是世界上所有政党都必须面对和高度关注的内容。苏共党群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方兴未艾到和谐相处、矛盾凸显到分崩离析、极度恶化的过程。

① 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4 页。

②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南方周末》1991-08-17。

列宁十分重视群众作用，曾把人民群众比作大海，共产党人和党的干部只是沧海一粟。布尔什维克党曾骄傲地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 60% 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最大城市中，每 5 名士兵就有 4 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②

斯大林把人民群众比作大地母亲，把布尔什维克党比作安泰。正是因为苏共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以及苏共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才使得苏联能够取得工业、农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和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诚如阿·舍斯塔科夫等在《20 世纪祖国史》中所指出的那样，“30 年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尽管极其困难，但广大劳动群众仍然满怀激情地工作”。在卫国战争荣膺“苏联英雄”称号的人中，74% 的人是共产党员，11% 的人是共青团员，超过 300 万的苏共党员在战斗中牺牲。苏共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引领着党群关系的良性发展，但是，在斯大林中后期，苏联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同时，也出现了干群关系疏离、群众利益受损的不良状况，这也可以看作是党群关系出现了裂痕。

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进行频繁的干部调动，不仅许多干部缺乏安全感，就是许多普通党员群众也被排斥，官员腐败现象呈蔓延态势，党员权利与作用被忽视，群众极为不满，党群关系的裂痕日益明显。这种状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尤为严重，这时，在苏联形成了一个队伍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不仅享受着各种各样的特权，而且还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贪污受贿，导致党群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戈尔巴乔夫时期，恶化了的党群关系并没有得到好转，苏共被大大矮化，共产党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丧失殆尽，已失去引领广大人民群众的号召力、影响力、凝聚力。这从如下两个方面即可以看出：一是大批苏共党员退党。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后，从 1989 年 1 月到 1991 年 1 月，苏共党员由 1948.78 万人降至 1651.61 万人，减少了 290 万人，同时，全国每年吸收的新党员人数也呈下降趋势。如在切良斯克地区，1986 年有 6000 人入党，1989 年为 750 人，1990 年 81 人，1991 年仅有 4 人。到 1990 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 1/5 的车间党组织、1/2 的党小组或解散或停止了活动。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二是由于修改宪法，苏共丧失了执政地位，同时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抛弃。1990 年底，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的苏共已经沦为在野党，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长也先后落到反对派手里。据 1991 年初的民意调查：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 13%，不支持率达 73%，苏共的支持率仅有 14%。

二、苏共党群关系恶化表现出来的问题

良好的党群关系是苏共执政的坚实基础，是苏共获得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然而，在苏共的党群关系恶化之后，就使得它的执政基础大大地受到了削弱，甚至成为苏共败亡的根源。在这里，笔者主要基于戈尔巴乔夫时期，来考察党群关系的恶化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有：

（一）党群关系的物质基础受损：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下降

党群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关系。能否让人民群众持续过上好日子，是营造良好的党群关系的物质基础。苏共执政后，由于实行的重工业优先，特别是军事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这就导致了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受到了严重影响。例如，1989 年在“消费品篮子”里的 1200 多种商品中，有 1050 种是短缺的；在 221 种食品中，有 188 种实行票证供应。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1991 年通货膨胀率超过三位数，日用消费品零售价比上年上涨 1.4 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14% －26%，大约有 1/3 －1/2 的居民生活处于贫困之中。① 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经济困难越来越严重，这极大地损害了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形象，使得广大群众对苏共的领导能力提

① 于滨《借鉴国外政党执政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延边党校学报》2007 年第 4 期。

出了质疑,对党和政府失去了信心。

(二)党群关系的精神基础发生动摇:信仰、信念受到质疑

在苏联,党群关系的精神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苏维埃俄罗斯报》的政论家谢尔盖曾写道"由于种种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的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千古之谜。目前没有谁给这个谜作出明确的解释。"①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否定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抛弃了马列主义群众观。改革措施的不现实性和改革成效甚微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进而导致群众的极大不满。同时,群众对苏共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执政方式失去信心,党群关系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走向了疏离。

(三)党群关系的组织基础脆弱:陷入混乱、松散

在苏共的各级组织实践中,党的组织生活陷入混乱。戈尔巴乔夫的干部改革导致党组织的各级干部大范围地调动,党的各项政策不断更改,组织人员及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导致整个执政局面混乱。苏共既不能在路线方针上代表人民利益,又不能在实践中切实维护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迫切要求。与此同时,各级领导干部的贪污腐化进一步使党在生活方式上、政治环境上以及感情上彻底背离了人民群众。他们为了私己利益深陷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当中,致使民怨载道,使人民群众对党的作风和执政能力彻底失去了信任和支持。

(四)党群关系的队伍基础:党员集体感、归属感丧失

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极大破坏,党员的基本民主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不仅使得普通党员对党的政治理念失去了认同感,而且他们作为沟通人民大众的桥梁作用也难以有效发挥;由于监督机制缺位和惩治制度的不完善,加剧了苏共内部高级领导层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的现象,这不仅使得苏共的形象大大受损,也使得普通党员的意义和价值无法体现,进而失去了应有的集体感和归属感;由于政治分歧和对党的信心的丧失,1988 年下半年苏共退党现象愈演愈烈,"1990 年全国共有 180 万党员退出共产党 1991 年,仅前七个月,退党者猛增为 240 万人,余下的 1500 多万党员相当多的人陷入了政治疲劳",②苏共党员对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厌倦冷漠,使得苏共的组织濒临瓦解。

(五)党群关系的异物:特权阶层、特权现象蔓延

苏联的特权阶层按照官职级别的高低,享有苏联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的各种特权。苏联的这种"特权等级制模式"大大加深了党群之间的隔阂。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当人民群众还并不富裕时,苏共党内就开始出现了特权现象,干部享有高工资、特供商品、专门医院、别墅、专门学校、豪华轿车及其他特殊服务。干部享受特权的制度,随着苏共执政的时间日久,更是名目日益繁多和制度化。与此同时,各种腐败现象开始滋生,并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久而久之,在苏共党内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苏联的剧变,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俄罗斯后来的事实证明,很大一部分原苏联党政官员,成为剧变的最大受益群体。如美国一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工作小组负责人费兰克·希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他们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③

三、结语

理论上,苏共要在保持先锋队角色的基础上,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并带领人民群众走向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这也就要求党要寓于群众之中,并保持良好的党群关系。然而,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苏共演化为一个具有高度官僚化、行政化色彩的政党,并逐渐脱离了人民群众,不再能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

①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南方周末》1991 - 08 - 17。

② 杨小燕《从原苏联解体看舆论导向的作用》,《理论与当代》1997 年第 6 期。

③ 转引自季正矩《腐败与苏共垮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07 年第 7 期。

益，这时，人民群众也就抛弃了它。所以，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时，苏联民众表现出来的出奇的平静与冷漠也就可以理解了。

苏维埃政权成为“套中人”的几点思考

倪稼民

（上海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十月革命胜利，俄国即刻确立了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苏维埃政权。列宁当时对此赞赏有加：“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①因为它采取了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三权分立”原则相反的、从理论和规范层面上更能体现人民主权的“议行合一”原则。在“议行合一”体制下，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关系是同一的而非多元的，是单向的而非双向的。立法权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可以绝对地、无条件地领导和监督行政权，而行政权却只能完全地无条件地服从于立法权，没有也不允许有抗衡立法权的法律地位、资格、力量和手段。苏维埃制度，得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确认。从理论架构上说，它确实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制度理念，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

由于没有民主传统、文盲率超过 70%，没有办法直接通过人民群众选举代表来实行管理，而只能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由此，任命制产生并被不断强化。这种做法，使得中央机构拥有极大的权力，控制和操纵了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的事务。“先锋队”即俄共（布）执政党最高领导层的作用、党对政权机构的影响急剧扩大和增强，或者说党已经覆盖了政府。

从法理上说，苏维埃是苏俄（苏联）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是唯一的立法机构，而党的决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党的决议，对于苏维埃政权机关来说，却是最高的律令，具有巨大的约束力，并要求无条件地得到执行。对此，列宁解释道“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说起来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列宁强调“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领导自己的国家。”②应该说，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列宁又对“党即苏维埃国家”的观点作了反复强调，从而为党国同构（即党国一体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只要以整个中央的名义声明（并论证）以下几点就够了：……无产阶级 = 俄国共产党 = 苏维埃政权。”③这对苏联政治制度的建构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列宁去世，在经历了几年党内残酷的斗争后，开始了斯大林时代。为了加速工业化需要，更强化了以党代政、独揽一切权力资源的体制。斯大林说：党要“检查各管理机关的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纠正那些不可避免的错误和缺点，帮助这些机关执行政府的决议，竭力保证它们得到群众的支持，而且它们通过任何一项重要的决议都非有党的有关指示不可”。④卡冈诺维奇在谈到党中央机关作用时，更直白地表达了党领导一切、包揽一切的观点。他说“中央委员会不仅花时间来指导国际政策问题、国防问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08 – 309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0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9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83 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92 – 93 页。

题和经济建设问题,而且还同时处理这样一些问题,诸如:课本,图书馆,文学,剧院,电影院;处理这样一些问题,诸如:唱片的生产,肥皂的质量等等。"①这里,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苏共对政府的领导的绝对性、全面性、细微性和深入性及党在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绝对权威和至高无上性。

对此,当时就曾有过一些非常尖锐而中肯的批评。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合的)在一份《致全俄罗斯公民书》中就指出"自从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②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活动家柯罗连科也揭示道:党"把一切都抓在自己的手中,甚至包括原来一切顺利进行,而且一直仅由社会力量管理而无官方干预的事务",因为布尔什维克几乎认为,'就连小草也不能在阳光下自由生长,必须由'政委'和他们的部下采取措施帮助它们生长";③苏维埃政权被党裹挟得越来越弱化、虚化,越来越陷于"套中人"境地。

这里的问题首先在于苏共将国家政权与国家行政权力混为一体,尽管最高苏维埃在法律上是苏联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实际上却成了通过党的指示的表决机器;而党则越过最高权力机关直接指挥并亲自领导国家行政机关,使国家机构日趋萎缩,形同虚设,也使党陷于纷繁细碎的行政事务中根本无暇顾及自身建设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其次,由于以党代政,这种法外之权导致了权力运作的非程序化,而法内之权又被弱化虚化,严重损害了党的领导与执政的合法性。所谓党的领导,其重点应当放在国家权力机关,而不是放在国家行政机关,主要是领导国家政权(这种权力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绝对上层建筑的),而不是具体管理国家的行政事务权力(这种权力则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类似于物质性的上层建筑)。苏共实际上在一开始就不自觉地混淆和独揽了所有的权力,在苏维埃机关完全缺场的"议行合一"原则,在党的机关里充分体现出来。最后,当苏联已经消除了文盲后并没有意识到或已经不愿意去意识要培育和塑造独立的公民。所谓体现议行合一的"人民主权"不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民之上,而是具体的、独立的、鲜活的公民个体之上的人民主权。而政治民主、主权在民是必须落实到操作层面才是真正有效的,即需要提供渠道和保障机制,否则就是一纸空文。

那么,谁来为这个既执掌国家权力又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苏共套上缰绳呢?尽管,布尔什维克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她认为自己理所当然代表人民执掌权力(不管是国家权力还是行政权力),并坚定地认为自己能够自律。但权力这个极具腐蚀性的、没有灵魂的尤物几乎会摧毁哪怕有很强意志力的个人预设的道德底线。事实也是如此,坚信共产主义的理想者后来已经越来越不想打破高度集权于党的局面,并将自己等同于权力。而这种权力结构,使已经具有"自我合法性"论证倾向的党进一步走向绝对化和神圣化。④任何质疑这个权力和敢向其挑战的行为都被视为反党行为,都将消灭在古拉格群岛上。与此同时,斯大林时期正式确立的干部特权制使得入党做官成为人人向往的美差,入党已经不是因为信仰、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当干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得到更多的名利。这个党开始远离她所代表的人民。随着特权制的发展,一个特权阶层——官僚利益集团在苏联诞生,"因此,具有政治精神的革命就适应着这种精神的狭隘的、二重的本性,靠着牺牲社会本身的利益,在社会上组织了一个统治阶层出来"。⑤马克思的话对于在 20 世纪俄国革命以后出现的极权的政治官僚集团来说几乎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谶语。而那个控制和渗透一切的党的权力机构,用权、用名、用利以找到更多的知识阶层的人为之鼓噪、为之歌功颂德,而任何不合作、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不是受到迫害打击,

---

① 卡冈诺维奇《从党的第十六次至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 年。转引自阿·阿夫托尔汉诺夫《权力学》(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45 – 346 页。

② 《〈联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致全俄罗斯公民书〉(不早于 1918 年 1 月 51)》,《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4 页。

③ 柯罗连科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19 年 6 月 2 日),引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4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40 页。

④ 参见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1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88 页。